

白兴华 著

赵翼史学新探

中
华
文
史
新
刊

中华书局

ZHONGHUA WENSHI XINKAN



本书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结合、诗史互证、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赵翼史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分析并评价赵翼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史学成就，认为其著作《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在对历代史事的考证、对历代正史编撰的研究和史学批评、治史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代表了清乾嘉时期考证史学的最高水平。对同时代三大史学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作了比较研究，揭示了赵翼史学的鲜明特色。

中华文史新刊

赵翼史学新探

白兴华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翼史学新探/白兴华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中华文史新刊)

ISBN 7-101-03719-4

I. 赵… II. 白… III. 史学史—中国—清代 IV. K09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385 号

书 名 赵翼史学新探

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

著 者 白兴华

责任编辑 薛有红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frac{1}{4}$ 字数 156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719-4/K·1567

定 价 18.00 元

赵翼史学:乾嘉学术的珍品(代序)

陈其泰

百年史学推瓠北,万首诗篇爱剑南。^①

这是近代著名史家陈垣的诗句,他将赵翼的史学造诣与陆游的爱国诗歌成就并提,推崇备至。清朝乾嘉朴学盛行约有百年,学者辈出,其中被推为考史大家者即有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三人。唯独赵翼在近代史学家陈垣心目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原因何在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赵翼史学在朴学时代显示出鲜明的学术个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到了近代,更具多方面的启迪意义。赵翼以数十年的精力,广泛搜集资料,爬梳剔抉,考证史籍著述体例的演变和历史事实的真相,所著《廿二史札记》一书,涉及自《史记》至《明史》共二十四部“正史”(《唐书》和《五代史》都包括新、旧两部),旁及杂史和其他典籍,并和赵氏所著另一考证笔记《陔余丛考》中许多条目足资互相发明,充分表现出赵翼的精深功力。而在治史旨趣和学风上,赵翼尤为出类拔萃,他有开阔的视野,深刻的历史观察力,又有优良的治学方法。《廿二史札记》一书,堪称是乾

^① 见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载《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 1982 年版,第 127 页。

嘉朴学时代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书中的多方面成就还需要我们运用现代眼光深入地发掘和诠释。

一、进化史观和治史旨趣

赵翼(1727—1814)在史识上比同时代人明显高出一筹,他成功地运用联系和变易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此乃得力于他有朴素进化的哲学观作指导。处在当时崇尚考据、不喜议论的时代,赵翼的朴素进化观点不是在史著中直接论述,而是在诗句中以形象的手法表达。他写有两首有名的诗作: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①

这两首脍炙人口的诗作,本是针对当时文坛上的复古倾向而发,但它们却以清新生动、浅显易懂的诗句揭示出一种哲理、一种变革的历史观点:新陈代谢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人类总是后代胜前代,不断地追求变革、创新。古人的东西再好,如果泥古不变,也必然要陷于陈腐,被前进的时代所淘汰。赵翼生在考据盛行、“唯古为贵”的乾嘉时代,这些诗作所表达的提倡变革创新的观点,无疑是理论思维的一次激动人心的闪光!

赵翼充满着探求新知的热情,善于从所接触的事物中获得哲理的启示,因而他的认识总是保持着源头活水。他有诗句记述每游一次西湖都能获得新的体验:“独兹西子湖,我来亦已屡,一到一

^① 《欧北诗抄》绝句二《论诗》。

回新，不厌三四五，始识无尽藏，今览非昔睹。”^① 总结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不断推向新境的深刻哲理。他又因观望海景而悟出宇宙空间无限广远，有诗云：“中原水皆地所包，至此始信水包地。不识此水又因何物包，六合以外真难议。”^② 尤应提及的是，他由于见到西洋自鸣钟、时辰表，认识到西洋人制造之机巧、技术之先进，进而领悟天地之大，到处都有开辟之圣人的道理，这在当时更堪称是冲破千百年封建时代闭塞眼界之伟论。《檐曝杂记》卷二“钟表”条云：“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今钦天监中占星及定宪书，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洪荒以来，在璇玑，齐七政，几经神圣，始泄天地之秘。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他听了西洋音乐，更意识到西洋文化确有先进之处，引申出中国士人应该克服保守和自大的成见，努力探索域外新事物的深刻道理，有诗云：“始知天地大，到处有开辟。人巧诚太纷，世眼休自窄。域中多墟拘，儒外有物格。”^③ 赵翼自觉地认识到迫切需要破除士人根深蒂固的狭隘意识，阐述儒学以外有先进文化、中国之外有圣人的道理，代表了乾隆末年认识的最高水平。这种开阔的视野和不断探索新知的态度，与其朴素进化历史观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同样是赵翼治学创造性思维的源泉。由于赵翼在理论思维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才使《廿二史札记》一书在乾嘉时期众多考史著作中脱颖而出

① 《瓯北集》卷三十二《同乡陆蓬庵观察招游天竺、龙井诸胜，午后泛舟游湖即事》。

② 《瓯北集》卷四十一《杨舍城北登望海楼》。

③ 《瓯北集》卷七《同北墅漱田观西洋乐器》。

出,显示出特有的经世意识和对大量历史问题的深刻见解。

赵翼的治史旨趣,在其《廿二史札记·小引》中有含蓄而深沉的表述,并且,饶有兴趣的是,他的旨趣得到同时代考证学大家钱大昕的由衷嘉许。赵翼所概括的本人著述宗旨值得我们仔细体味:

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比以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①

赵翼揭示出他研史的重要目的,是探讨历史时势的变化,并且要究明治乱兴衰的内在原因。这种治学志识,在乾嘉朴学时代实为凤毛麟角,难能可贵。尤应注意者,赵翼自认他是顾炎武经世学风的继承者。清初顾炎武的主张,实际上包括倡导经世致用和重视考据两个方面。他经历了明清之际朝代鼎革、“天崩地解”的大事变,因而呼吁学术应当发挥“经世”作用,主张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总结兴亡治乱的教训,以匡救当今社会的弊病。《日知录》中有不少条目,是揭露理学空谈造成明朝的灭亡,以及揭露明代封建剥削之沉重、政治之腐败。顾炎武又吸取明代士人“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教训,主张从文字、音韵、训诂入手,求得对儒家经典的准确了解,把“经术”与“治道”结合起来。他本人对音韵、文字、金石等项学问很精通,《日知录》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条目就属于考证

^① 《廿二史札记·小引》,据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下引《廿二史札记》本文者,均据此。

方面,显示出其考据兴趣和深厚功力。从清初到赵翼的时代,相距已有百余年,社会状况和学术风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朝代更迭的动荡局面早被清朝统治的相对稳定所代替,伴随而来的是清廷对汉族士人采取压制与笼络两手并用的政策,最令士人震悚畏惧的是统治者屡兴文字狱,康熙时即有庄廷铨案、戴名世案,雍正、乾隆两朝案件尤多,治罪更加严酷,甚至捕风捉影,任意罗织罪名。在这种专制淫威逼迫下,士人为了避罪,只好闭口不谈现实问题,转向细小问题的考证。统治者对于这种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的烦琐考证工作也有意加以鼓励提倡。龚自珍的有名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①,便是当日士人心态的真实写照。因此,在考证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代,专重考证、忽视“经世”成为流行的价值取向,原先由顾炎武开创的学风只继承了一半,而丢掉了另一半。在此情形下,赵翼却以继承“经世致用”学风自任,在书的卷首公开亮出探求盛衰治乱和求实致用的旗帜。这深刻地说明,赵翼不媚俗,不随波逐流。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史学家应该把探求历史上治乱盛衰的演变和内在原因,作为治学的根本目的。在认为考据即学问的全部的众多朴学家中,赵翼诚不愧是具有特识的人物。无怪乎当嘉庆五年(1800)《廿二史札记》书稿完成之时,七十四岁的赵翼带着它专程从家乡常州到嘉定,送给比他小两岁、但名气很大的钱大昕征求意见,钱氏为他作序,作了极高评价:

所撰《瓯北诗集》、《陔余丛考》,久已传播士林,纸贵都市矣。今春访予于吴门,复出近刻《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见示。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

^① 《龚自珍全集》第九辑《咏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

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①

钱氏推许此书“有体有用”,即发扬了儒学经邦治国之体,具有经世之用。又盛赞赵翼探究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变化,显示出宏远的见识,因而使年老衰病的他,读后精神为之振作。这些话,完全符合赵翼著史的宗旨和书中的内容,绝非虚夸客套之语。而且,可以视为钱大昕这位在考证学领域具有通识的学者对于赵翼过人的史识,表示了衷心的敬佩。当时另一位学者李保泰作序,也极为赞叹赵翼书中所具有的特识:“方先生属稿时,每得与闻绪论,及今始溃于成,窃获从编校之役,反复卒读之。嗟乎!自士大夫沉湎于举业,局促于簿书,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持补救之方。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焉,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并热情地褒扬赵翼“得史学之大且重者”^②。对于考证学者在整理文献上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是充分肯定的。然从学术的层次说,一般的治名物训诂的考据家只求知其然,志在探讨有关治乱兴衰之故的学者才求知其所以然。因此,后者当然比前者居于更高的层次。经世目标和探求治乱盛衰变化的治史旨趣,正是赵翼取得卓著成就的根本原因。

王、钱、赵三家考证的对象都是历代“正史”,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止于新、旧《五代史》,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缺少《明史》与《旧五代史》,相比之下,赵翼研讨了全部“正史”,范围最广。从内容上说,王氏主要考证制度、地理等项,钱氏主要详于校勘文字、解释名物,赵书考证的范围则包括史例和史事两个方面,三人的侧重点并

① 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见《廿二史札记校正》附录二。

② 李保泰《〈廿二史札记〉序》,见《廿二史札记校正》附录二。

不相同。由于赵氏有朴素进化观和经世主张为指导,史识上居于更高层次,因而决定了《廿二史札记》最有光彩的地方在于下述两个方面:探求古今时代风会的变化,表达对于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切,因而超出一般考据著作的格局,抒发出对历史上许多重大问题的深刻见解,具有史论的色彩;赵翼尤其重视总结明代治乱盛衰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显示出鲜明的经世意识,这与同时代文人的粉饰太平之作更大异其趣。以下即对这两个方面分别加以讨论。

二、史论的特色

乾嘉朴学在训诂、考据、校勘等文献学范围成就显著,也可以说是微观研究发达的时代。但在宏观研究方面却大为逊色,就学术界整体而言,理论思维相当薄弱。梁启超对于朴学家治学路数非常熟悉,他在广州学海堂受到严格的朴学训练,对于朴学家的成就作过高度评价。又由于梁氏有近代眼光,因而洞悉朴学家沉醉于细小问题的考据、缺乏思维创造力的弱点,曾一再有过切中要害的批评。他称考据学“支离破碎,汨殁性灵”^①。“昔传内廷演剧,触处忌讳,乃不得已专演《封神》、《西游》牛鬼蛇神种种诡状,以求无过,本朝之治经术者亦然,销其脑力及其目力于故纸之丛,苟以道死而已。……近汉学之昌明,稟兹例也。流风既播,则非是不见重于社会,幽眇相竞,忘其故矣。呜呼,斯学之敝中国久矣!”^②梁

①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87页,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

② 同上,第92页。

氏又总括说：“乾嘉以后，号称清学全盛时代，条理和方法虽比前期致密许多，思想界却渐渐成为化石了。”^①

在此“思想界渐渐成为化石”的时代，却有赵翼的议论放射出异彩！他以独具的识力，另辟蹊径，注重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每能把大量分散材料加以综合，从而揭示出一个时代具有特别意义的问题，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作用。此类条目从形式上看是札记，实际内容却有如今日一篇篇极有份量的论文。其中所蕴含的高明史识和精彩议论，二百年后读来仍然感到具有活跃的生命力。

《札记》的史论特色，首先表现在赵翼注重探究历史的“势”和“变”，发掘隐藏在大量分散史实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教训。他总结了这样的警句：“读史以观世变”。^②从西汉初政治局面的特点，东汉的党锢，魏晋南北朝实行的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一直到明代政治腐败和民众沉重负担等多方面重要问题，都在他探讨和分析的范围之内。他论述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变化，就是“善于捉住一时代有特别意义之问题”的典型。他首先归纳概括出汉初政治局面出现了由世侯世卿贵族到“布衣将相”的重大变化。汉初众多文武大臣都出身低下，萧何、曹参等曾任下级属吏，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酈商、酈食其、夏侯婴等都是来自乡里的平民。樊哙、周勃、灌婴更加贫贱，分别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娄敬则是挽车的戍卒。“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所未有也。”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二“清初学海波澜余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五，第176页。

^② 《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条。以下凡引自此书者，只注明卷数和条目。

紧接着，赵翼分析这个变化经历了渐变，始于战国，定于汉初。“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宗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秦、晋、齐、楚各国为了加强自己和削弱别国，遂广招贤士，破格用人，于是有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孙臧、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至秦末群雄并起，高祖以匹夫起事，“其臣亦以平民立功而致身将相，天下变局，至是乃定”。赵翼还进一步分析，布衣将相定局之后，旧的残余依然存在，故有分封异姓王，以后又分封同姓王之举。至平定七国之乱以后，王国内任命官吏的权力收归朝廷。至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征辟、选举之势成^①。赵翼史识的高明之处，就是认识到了这是客观条件导致的必然趋势，即使“人情犹狃于故见”，也改变不了这种客观趋势，最后将旧法扫荡净尽。他又讲“天意已换新局”，“岂非天哉”，在这里“天”是与人情对举的，实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代名词。他的视野上起战国，下至两汉以后，爬梳了大量分散的材料，加以概括、分析，挖掘出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因此被后来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普遍采用。

像这样显示出深刻历史观察力的论述，书中还为数不少，这里再举出几个能给以有益启迪的例证。魏晋以降曾长期实行过“九品中正”选举制度，这是人所共知的。赵翼却能对“九品中正”实行前的酝酿，实行中的利与弊，以后当权者为何长期不予变革的原因，层层深入地加以分析。赵翼首先论证实行“九品中正”的缘起，是因为

^① 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

汉代察举孝廉制度产生了明显的弊端，“夤缘势利，猥滥益甚”，因而需要有新的荐举方法代替。实行“九品中正”制，是在魏文帝时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而规定的。赵翼又从《晋书》分散的列传中撷取材料，论述从提出建议到制度化的发展过程。在曹操时，已有何夔、杜恕提出建议，用人要在乡间选拔，州郡考士要看其行为。然后分析九品中正实行之后固然出现弊病，但并非一无是处。他举出《晋书》中何攀、卞壶、张辅、孔愉等传，证明“乡邑清议有主持公道者，中正官有秉公不挠者”。进而指出九品中正制流弊所在，是中正官评高下“全以意为轻重”，“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据上品非公侯之子，即当道之昆弟”，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赵翼以激愤的语调揭露说：“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那么，自魏晋迄南北朝三四百年，积弊至极而不予改革，是什么原因呢？赵翼回答说，原因即在“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① 透过表象，指出当权的既得利益者为其门户私利而顽固不变法，确是一针见血之论。

《札记》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集中论述东晋南北朝门阀制度的种种特点，与《陔余丛考》书中“六朝重氏族”、“谱学”两条相互照应、补充，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精彩议论。赵翼遍引魏、晋、南北朝、唐、五代史书中的记载，论述前后达五百年的历史现象，既典型、又具体。赵翼揭示出门阀制度盛行的根源是：六朝最重氏族。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是以矜门第者高自标置，其视后门寒素，不啻如良贱之不可紊越。”“而单门寒士亦遂自视微陋，不敢与世家相颉颃。”“当时风尚，右豪宗而贱寒峻，南北皆然，牢不可破。

^① 卷八“九品中正”条。

……其至习俗所趋,积重难返,虽帝王欲变易之而不能者。”^① 赵翼提炼出大量典型史料,描绘出门阀制度下畸形的社会现象。其时,高门与寒族有严格的界限,不能通婚。琅玕王源嫁女于富阳满氏,遭到沈约弹劾,称:“王、满联姻,实骇物听。……此风弗翦,其源遂开,点世尘家,将被比屋。宜置以明科,黜之流伍。”^② 庶族普遍的心理,是即使不能通婚,也愿与世族交际,甚至偶有接触的机会,也以为荣幸。如纪僧真曾向齐武帝请求:“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齐武帝回答说:“此事向江敳议定,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僧真乃奉旨去求见江敳,则登榻坐定,江敳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僧真丧气而归,告诉齐武帝:“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也。”甚至极凶恶狡诈的军阀,凭借其驰骋战场的气焰,也不能勉强求得,如侯景请娶于王、谢,梁武帝回答说:“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赵翼综合了这一类典型材料,得出结论说:“可见当时门第之见,习为固然,虽帝王不能改易也。”并进而指出,历宋、齐、梁、陈各朝,“立功之事,为国宣力者,皆出于寒人。”世族出身的人物,养尊处优,惯于以门第、服饰、风度相夸耀,却几乎不见为国家立功的人物。如王弘、褚渊等,在国家、政权改易之时,只求自保家庭门户的尊荣地位,“虽朝市改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此江左风会习尚之极敝也。”^③

《札记》卷十九“贞观中直谏不止魏徵”条,层层深入地论述唐太宗纳谏作风与极其重视吸取隋亡教训的关系,总结封建统治“多

① 《陔余丛考》前编卷三十七“六朝重氏族”条。

② 沈约《奏弹王源》,《文选》卷四十。

③ 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条。

难兴邦”的规律,此篇尤为乾嘉时代的大议论。赵翼首先肯定贞观直谏之臣首推魏徵,表达对贞观君臣间开明政治风气的由衷向往:“太宗尝谓徵曰:‘卿前后谏二百余事,非至诚何能若是。’又谓朝臣曰:‘人言魏徵举止疏慢,我但觉其妩媚耳。’徵以疾辞位,帝曰:‘金必锻炼而成器,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岂可去乎。’至今所传十思十渐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皆听纳之。此贞观君臣间直可追都、兪、吁、咈之盛也。”称赞贞观君臣可说是实现了古人对开明政治的理想。赵翼接着推进一层,指出其时直谏者不止魏徵,遍举新旧《唐书》中各传,说明其时薛收、孙伏伽、温彦博、虞世南、马周、王珪、姚思廉、高季辅、戴胄、张玄素、褚遂良、李乾祐、柳范、刘洎等,都曾对唐太宗直谏面争。其中,虞世南谏田猎,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谏宫体诗不宜作,谏无以功高自矜,无以太平自息,都针对比较重要的问题,不留情面地提出谏阻意见,太宗嘉许说:“群臣皆如世南,天下何忧不理。”张玄素谏修建洛阳宫耗费民力,而且毫不客气地说这种举动比大兴土木、造成天下怨叛的隋炀帝更甚,太宗问他,那我比桀、纣怎么样?玄素回答:“若此役卒兴,同归于乱耳。”由于玄素无顾忌地讲出事情的严重后果,才终于使太宗醒悟过来,感叹:“我不思量,遂至于此。”太宗还在宴请虞世南诸位大臣的酒宴上,称赞这些净谏大臣敢于“批逆鳞”,赵翼由此引出论断:“诸臣敢谏,实由帝王之能受谏也。”中肯地分析了在专制主义体制之下,官员是否敢于建言,开明政治局面能否出现,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实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论述的第三层。第四层,赵翼再深入一步提出,唐太宗是平定天下、智力过人的君主,按常理应该自视甚高、惯于随意驱使臣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乃虚怀翕受,惟恐人之不言,非徒博纳谏之名,实能施之政事,其故安在哉?”赵翼回答说,根本原因是“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

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谬。……此太宗所亲见也。唯见之切而惧之深,正张廷珪所云,多难兴邦,殷忧启圣”。赵翼所总结的这一客观规律是极其重要而深刻的。唐朝的兴起正是建立在吸收隋亡教训基础之上,魏徵等贤臣告诫唐太宗: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虑后果,驱天下以纵己欲,导致身死国亡,“陛下应以隋为鉴”。赵翼真正做到了能从历史动因总结唐初开明政治局面形成的时代条件:“此当时君臣动色相戒,皆由殷鉴不远,警于目而惕于心,故臣以进言为忠,君以听言为急。”读者随着赵翼层层深入的分析,由魏徵直谏而认识群臣诤谏形成风气;又进而认识关键在帝王能受谏;又进而认识由于特殊的时代条件才产生这一局面。不仅获得关于隋末唐初政治人物的大量感性认识,更在哲理上受到深刻的启示。论述至此,本已相当完满。但赵翼犀利的议论却一发而不可收,至文末又向前推进:“其后勋业日隆,治平日久,即太宗也不能无稍厌。”由于条件变化了,唐太宗纳谏的态度也起了变化。故魏徵作了言简意赅的描述:贞观之初是导人以言,态度主动恳切;三年后见谏者悦而从之,主动性已有不同;近一二年则勉强受谏,心中却有老大不愉快。“是可知贞观中年,功成志满,已不复能好臣其所受教。”有功而产生志满,志满而听不进去别人意见,曾以开明形象出现的唐太宗也逃脱不了这一规律。最后,赵翼笔锋一转,更尖锐地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的论点:艰苦创业的伟人尚且如此,那么对于生活在太平逸乐环境的君主来说,受谏就更困难了。“惧生于有所惩,怠生于无所做,人主大抵皆然。若后世蒙业之君运当清泰,外无覆车之戒,而内有转圜之美,岂不比太宗更难哉!”赵翼的这些话,实际上暗示着统治者骄傲疏怠,即孕育着行将到来的危险。这里所说的生当太平时日的“人主”,当然也包括在逸豫环境中做皇帝的“十全老人”乾隆,细心的读者于此不难

体会出赵翼“经世”的微旨。

他如“党禁之起”(卷五)、“六朝清淡之习”(卷八)、“六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卷八)、“唐节度使之祸”(卷二十)、“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产”(卷三十)、“明初吏治”(卷三十二),以及《陔余丛考》中的“谱学”、“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等,也都是揭示一个时期历史特点的重要条目,这里不再一一论列。

揭露、抨击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弊政,是《札记》史论特色的又一重要体现。

赵翼怀有正直史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同情民众疾苦的责任感,因此对封建统治者的暴政和罪行深恶痛绝。同时代的朴学家孙星衍有见于此,赞誉《札记》一书“于前代弊政,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①。稍后的张维屏也认为,赵氏“所撰著均能使人增益见闻,通知时事,较之断断考据于无用之地者,似为胜之”^②。譬如,赵翼批评汉武帝时治狱案件繁多,治罪严酷,株连极广。诏狱所系二千石官员不下百余人,其他大案一年多至千余宗,株连多者数百人,捕人范围达数百里,以严刑逼供定罪,致使百姓一闻有罪案发生,远近逃亡一空。有的案件几起几落一再捕人,十多年了仍相互告发治罪。廷尉和中都诏狱逮捕至六七万人,受牵连者以至十余万。“足可见当日刑狱之滥也,民之生于是时,何不幸哉!”^③汉武帝时代是封建统治的盛世,赵翼却能揭露其阴暗面,这同样说明其历史见识的高明之处。他又论述历代宦官为害朝政,日在人主之前,以谄媚而售其奸,昏庸之主则妄加信用,于是阉人出入宫廷,口衔天

① 孙星衍《赵瓯北先生墓志》。

② 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卷三十八“赵翼”。

③ 卷三“武帝时刑狱之滥”条。